**中国的改革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验启示**

巴基斯坦前大使赛义德·哈桑·贾维德（Syed Hasan Javed）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改革政策。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发展中国家内，也有许多人为这一成果欢欣鼓舞。这些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导致中国发生史诗般转型的重大改革，我想分享一下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我1980年9月到达北京，当时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大不相同，对外国人来讲，最吸引眼球的便是满目骑着自行车、身着绿色蓝色制服的人们。那是几乎没有汽车和出租车，食用油、糖、面粉等基本消费品供不应求。然而，中国人却慷慨好客、热情洋溢。政府从稀缺的外汇资源中进口到的少量商品，都要从为数不多的“友谊商店”里买到，外交家经常光顾这里，用那些被称为“外汇”的硬通货购买商品。外国人，特别是外交官们，感到些许娇惯。

1978年，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施行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发达国家，人们都用“吃饭了吗”来打招呼，可想而知，一日三餐都是一种奢侈。几十年的战争和冲突、西方的敌对、外国侵略、意识形态上西方强加的制裁，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限制了中国选择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确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孤儿院”。在解放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群众、党和国家的生存是中国1949至1979年间的政策重点。两位伟大的领导人在1976年相继过世。

1979年，中国贫困人口有70%，国家亟需进行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首先，必须承认，这不是通过“点石成金术”或“神灯”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从西方文明的兴起中汲取了正确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从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学习，后来又学习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中国人也掌握了进入机器时代的正确过程，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印度妄想通过“展示”城市发展、信息技术、交通运输业和珠宝业潜入工业化时代，但三分之二的印度人每天只能靠2美元维持生存，且其国民收入差距极大，基尼系数为亚洲最高。在许多方面，印度在今天，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改革的史诗化进程。尽管受到西方大国及其主流媒体的支持，但印度仍因其妄想心态、宗教压迫、种姓和阶级不平等、社会压力及对邻国的痴迷而发展缓慢。

中国改革计划的各个阶段内，西方观察家均预测短期内其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相反，中国的经济繁荣一直未曾间断，持续到90年代、00年代，中国已经“努力挣来”了自己的成就，用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使之成为了可能。这意味着“跨越”的过程是渐进的、探索的、务实的、集中的、任务导向的。机构和政策不断做出反应和调整，并预期过渡时期内后面每个阶段的经济治理间所存在的连带因果关系。例如，对经济生活的一个阶段进行改革后，其显现的优势促使相关部门还有进行必要改革，形成互补，从农场私有化，到农场所有权固定、农产品定价、减少农业补贴、发展农产品市场、农场中介机构、农业信贷市场、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城市工资调整、计划性城市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采用、金融和银行业改革等等。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许多因素，其中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集体领导、心态转变、公务员制度改革、借鉴全球最佳经验、规则程序简化、法治：个人自由和创业精神、社会资本和软实力的作用等。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中，中国也发挥了巨大的优势，除了有庞大的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消费群体众多，还有源源不断的纪律严明、技术精湛、生产力强的人力资源。我刚好在中国呆了十年，遇上了这一“史诗般转变”的“构思阶段和实施阶段”，最初从1980到1987年，后来从2001到2003，再后来对中国进行定期访问，我感到中国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集体领导：改革派领袖邓小平卓有远见，是一个伟大的团队建设者。他看重才能和品德，性格开朗，在他眼里，没有受害者，也没有恶棍。他领导的改革派领导人们成为变革的灯塔。他不仅受到朋友们的尊敬，更受到敌人们的尊敬。他重视品德、才能和效率，相信建立共识、实用主义、谦逊、节制和实效。他对培养未来几代领导人、继续推行他的改革设想兴趣浓厚。

心态转变：发展是一种精神状态，必须作为一种社会转变的文化。1978年中国改革派领导层推动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浪费了中国的潜力，造成了毁灭性后果，导致中国1978年贫困人口超过70%。中国人将“平等主义陷阱”强加到自己身上，在意识形态上崇拜贫穷，“人人都吃大锅饭”，不论贡献多少，均可享受终身稳定的工作和社会保障。改革十分痛苦，需要人们改变心态，自力更生，通过合法手段和辛勤劳动致富。党的思想路线从“改造知识分子”到“让知识分子改造社会”转变。中国认识到，现代化是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口号和大型运动的结果。知识分子的地位从过去的“臭老九”，转变为1978年后的贵宾等级，高等教育投资成为对外开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孔子、老子、孙子和佛陀等古代伟大的教育学者得以恢复名誉。

借鉴全球最佳经验：中国高级领导人、副总理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回国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此后，中国政府立刻向国外派出数以百计的“留学外交使团”，学习全球最佳实践。这些使团中有几十个前往了巴基斯坦。新加坡已故政治家、开国元勋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历史》中回忆，1978年11月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仅在第二年，中国政府便委派了150多个留学使团。他回忆道：“他们带着录像机、照相机、笔记本、钢笔、铅笔。”这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的“阶级战争”心态形成鲜明对比，那时，用官方的说法，“外国资本不受欢迎”。

公务员制度与治理改革：改革派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公务员制度，“经济改革和门户开放”注定会失败。邓小平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规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愿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权力下放。各部委进行重组，监管和收入职能分离，快速转型、清除老旧，根除腐败、严惩浪费，采取惩罚和威慑措施，进行高效、合作、监督、监控、实施、成果等能力建设，通过有效的边界管制措施，建立健全法律和秩序，使用现代安全设备，建立人际情报与居委会，密切进行巡回观察/监测，发挥电子印刷媒体的积极作用，进行法律制度改革，使用“调解法庭”处理民事纠纷等。重视品德在公务员招募中成为不容置疑的要求，“红”或是身为共产党员是不够的，人事部门有权雇佣，也有权解雇。“吃大锅饭”的原则不复存在，公务员工作的永久性被废除了。经过一系列改革，全国公务员人数从1978的1600万缩减到2010的400万，中央部委的数量从1978的79个减少到2010个的28个。由此，中国废除了繁文缛节，简化了规则和程序。

简化规则程序：1949至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高度官僚化，由1600万名公务员管理的政府臃肿不堪，成为“择业的最后选择”，对此最入流的描述是“繁文缛节”或“关廖竹艺”。即使车辆登记这样极其简单的工作，也要走几百个流程，拿到几十个盖章和签字。难怪外资不仅受到政府厌恶，而且在政府中闻所未闻。1979年至2015年间，改革派领导层将政府规模削减到四百万人，简化规则和程序，在“一个窗口”“一间屋内”便可办完事情。改革派领导人认为，复杂的规则和程序不仅阻碍经济发展、企业发展、外资引进，而且还会滋生腐败。精简复杂的政府规章是集中规划时代（1949年至1979年）的遗产，可以促进经济腾飞。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能够在25年中保持投资占GDP的35-40%。

法治：个人自由和创业精神：1978年以前在中国盛行“安全偏执”，中国社会畸形。每个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和外国人，都是嫌疑犯，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发展。改革派领导层制定法律，保障个人自由和尊严，安全组织的权力被削减，外国投资者、华侨、游客和留学生都受到了欢迎，并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便利。与西方汉学家的预测相反，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决定进一步开放。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评估可信度不高，并且事实证明他们的评估一直是错误的。近五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在预测并寻找“政治自由主义”的迹象，但一直没有找到。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开放，世界上存在着某些误解。尽管中国已经从“安全状态”转变为“经济状态”，但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之前，（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最普遍的误解是，中国正在无情地走向“政治自由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内，21名村民签下“生死状”，将公社土地分成21份，各自承包。事情很快传播开来，随后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有些人认为这违反法律，应受惩罚，而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推翻过时的苏联公社制度，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而代之。农民可以自由种植庄稼和蔬菜，将多余的粮食在“自由市场”出售。这项措施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改变了农村。后来证明，这是经济改革的基石。收入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好的技术、种子和研究推广方法。这项举措改变了农村。合作社成立初期，农民还可以成立中小型农产品企业，并签订合同雇佣季节性劳工，由此，农村工业化在基层繁荣兴盛。

乡镇企业：农业部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过剩的农产品可以出售，收入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好的技术、种子和研究推广方法。然而，农业现代化导致数百万农民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工作。于是，改革派领导班子成立了乡镇企业，为生产玩具、家电、刺绣、礼品和日常用品的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主要面向国外市场，成为“全球工业厂房”。TVE第一代首席执行官（CEO）便是村官和朝鲜战争老兵。

人力资本投资：中国的高等教育继承了苏联模式，即意识形态教育、条文主义、不加批判，出现了“大跃进”、“文革”、“自给自足经济”等灾难性后果。1978年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对新学科、新科目、新专业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解放初期，中国在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了大量投入，扫除文盲和传染病。直到1978年底，大多数人才刚刚达到最基本的识字水平，即有能力阅读报纸和基本卫生设施。但这些只够维持生计，教育程度如此低下，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集中规划时期，高等教育要求“平等”，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高等教育追求“质量”。改革派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偏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型展示性项目”，无法满足中国的需要。改革派领导层大量投资高等教育，20世纪80年代每年派数千名学生到西欧和日本的高校，其后派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1980年至2015年间，共派出400多万名学生，其中超过百分之六十都已返回中国，为其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海外留学人员作为中国制造市场的中介机构，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并不断引进技术、技能和方法。

调动海外华侨：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干预，几十年的内战、经济灾难和普遍消沉，过去二百年中，有五千万华人离开中国，因“安全偏执”而不敢重返祖国。由于受到儒家、道教、佛教的勤劳、自律、节俭、孝道等价值观影响，这批中国人在各自的职业和居所中成功地成为“赚钱机器”。改革派领导层集中力量吸引他们，但他们在改革派领袖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后才为之所动。1980年到2015年间，海外华侨的投资占到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

经济特区：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他对新加坡的成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新加坡政治家、开国元勋李光耀在他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中记载，他告诉邓小平：“新加坡所取得所有成就，没有一个是中国不能取得、不能做得更好的。”邓小平听后，返程途中费心准备将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会议通过了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经济特区”的理念，率先在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的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随后又增加了十四个。这些特区作为技术转让的孵化器和媒介，传播全球顶尖的企业经营方法，采用国际公认的管理技术。1980至2000年的第一阶段，政府将重点放在潜力最大的沿海地区和城市，而非“广撒网”而导致心力交瘁力不从心。

出口文化：经济改革计划也基于中国出口的对外开放政策。借鉴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验，中国开始以玩具、纺织品、家电、食品加工、体育用品、礼品和纪念品、刺绣服装、地毯、家具、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出口，逐渐向计算机、机械、设备、工厂、发动机、飞机、汽车、铁路等高科技产品进军。由于经济特区，中国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并于2002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促进“出口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投资研究和开发：事实上，生活中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学习可以通过重复、重新制作和复制来实现，这就是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国人是敏锐的观察者，发明了钟表、丝绸、纸张、火药，遗产丰富。1980到2000年现代化初期，中国企业购买了最新型的电子器具、设备和机器，重新加工，对样机进行测试，然后使之商品化，批量出售。成品不仅价廉，而且售后服务更优。

**结论**

中国在35年的时间内取得了西方国家近30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中国人一直对自己的成就十分谦虚，不像其他人，尤其是印度人，他们最近承认在IFI的建议下捏造国民收入帐目，使其“更为好看”。中国不为举世瞩目，不为领导全球，但是，中国的成功故事不应该由于地缘政治的压迫而在国际社会中被掩盖。中国越早实现成功，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就越有利。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知道，中国的经济和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这就是为什么讲“中国故事”如此重要。中国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和许多底层结构改革。这一转变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到“原始工业化”，再转变为“世界工业工厂”，从国家所有制到私有制，从自给自足到开放政策，冲进全球化浪潮。在中国，转型促进增长，增长促进转型，因此，很难识别哪个单一因素是“连锁反应”的“催化剂”或“触发器”，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连续30多年GDP增速达到9-10%。

世界面临着领导危机之时，习主席追求亚洲及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安全，这令人十分欣慰。在他的有力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国，成为全球化领导者，引导科技创新，致力解决气候变化，维护公平正义与国际法，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西方是否承认中国的崛起并不重要，历史的时钟无法倒拨。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能取得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不能。这是因为，在任何不平等的社会中，由于选举、王朝、部落、族裔和地区政治等现实原因，特权精英阶层受到政府的青睐，经济学家称之为“排他性提取经济学”。而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文革的阶级斗争在1978年便被深深埋葬。

改革派的几代领导人已经学会了有效管理“变革”之术，以确保平衡与和谐、稳定与繁荣。中国从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中汲取了正确的经验，并在实施之前对其进行了尝试和测试。其实，正如英语中的一句话，“归根结底是领导”。中国有幸拥有邓小平等如此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们，追求“中国梦”，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欧亚非以及拉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与习近平主席有共同的愿景。